

# 广安明代兴国寺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

刘 敏 (广安市文物管理所)

摘要：兴国寺“始于汉”说，经唐贞观和明代两次重建，是一座规模宏钜，保存完整的大木作建筑。因保护维修工作之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测绘。多种形式的斗拱与运用，形成了兴国寺的建筑特色；“有佛即寺”的臆断，造成了“始于汉”创的附会之说。

关键词：兴国寺；调查；建筑特色；始建年代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76-03

兴国寺，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城南新平街南侧，面临渠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风貌，又俗称为“南苑”。现为广安市内规模宏钜、保存完整的一座大木构建筑物。殿内金檩下大额上墨书“唐朝敬恭州年农年丙子正月初一丙申朔月二十日庚申吉旦兴国寺住持修造”及瓜柱内额墨书“广安千户守御所武德将军正千户亦铭武略将军副千户吴源史”等唐、明时代题记，广安市文物主管部门于 2003 年 10 月，组织对兴国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测绘工作，现就调查情况纪要于后，并就兴国寺的始建年代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试作初步研究。

## 一、建筑概况及建筑特色

兴国寺原为建筑群，今仅存大殿。建筑坐西南向东北，平面呈矩形。面阔 5 间 22.35 米，明间较阔，为 5.25 米，次间宽 5.1 米，梢间宽 3.45 米；进深 3 间 13.8、通高 12.11 米。建筑面积 316 平方米（封三）。

单檐，歇山式屋顶，绿色琉璃筒瓦屋面，绿色琉璃正脊，脊两端饰正吻，中为琉璃宝顶。瓦当为蟠龙纹饰，沟滴为凤肱纹饰。

梁架为殿堂抬梁式大木作结构，八椽九檩，殿内除藻井部份外，均为澈上明造。其共置木柱 26 根，内柱为梭形柱，计 8 根；外檐柱为直形柱，计 18 根，侧脚收分显而易见。梁架高跨比例为 1：3.6，坡平缓。

建筑共施斗拱计 80 攒，以承托挑出檐和梁

枋之荷载。外檐为六铺作斗拱 42 攒，分转角铺作，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等三大类，式样构造分之为九种形式。

转角铺作：4 攒，分两种形式。

DG1：前檐转角铺坐 2 攒。正立面高 0.94、宽 1.64 米，侧立面宽 1.4 米，高与正立面等同，栌斗上宽 34、下宽 26、高 25.5 厘米。

DG2：后檐转角铺作 2 攒，高 0.64、宽 1.44 米，栌斗与 DG1 式无异。

柱头铺作：14 攒，分三种形式。

DG3，6 攒：正立面高 0.64、宽 1.65 米，侧立面高 0.64、宽 1.44 米，栌斗上宽 34、下宽 26、高 25.5 厘米。

DG6，4 攒：正立面高 0.94、宽 1.65 米，侧立面高 0.94、宽 0.82（内结构为枋支垫），栌斗上宽 34、下宽 26、高 25.5 厘米。

DG9，4 攒：正立面高 0.64、宽 1.64 米，侧立面高 0.64、宽 1.44 米，栌斗上宽 34、下宽 26、高 25.5 厘米。

补间铺作：24 攒，明间、次间间各施 2 攒，梢间间各施 1 攒，分为四种形式。

DG2，2 攒（其中 1 攒已毁），正立面高 0.94、宽 1.65 米，侧立面高 0.94、宽 1.44 米，栌斗上宽 34、下宽 26、高 25.5 厘米。

DG4，6 攒，正立面高 0.64、宽 1.65 米，侧立面高 0.64、宽 1.44 米，栌斗高 25.5、上宽 34、下宽 26 厘米。

DG5，7 攒（其中 1 攒已毁）；正立面高

0.94、宽 1.65 米，侧立面高 0.94、宽 1.44 米，枋斗高 25.5、上宽 34、下宽 26 厘米。

DG8，8 攒：正立面高 0.64、宽 1.44 米，侧立面高 0.64、宽 1.44 米，枋斗高 25.5、上宽 34、下宽 26 厘米。

殿内明间、次间施五铺作攀间铺作计 38 攒，斗拱间施枋，分别形成三个藻井。隔架科斗拱按形制特色分为四种形式。

DG10，8 攒：正立面高 0.93、宽 1.24 米，侧立面高 0.93、宽 1.44 米，枋斗上宽 52、下宽 34、高 25.5 厘米。

DG11，4 攒：正立面高 0.926、宽 1.24 米，侧立面高 0.93、宽 1.24 米，枋斗上宽 52、下宽 28×36、高 28 厘米。

DG12，10 攒：正立面高 0.93、宽 1.24 米，侧立面高 0.93、宽 1.24 米，枋斗上宽 44、下宽 34×30、高 26 厘米。

DG13，12 攒：正立面高 0.93、宽 1.24 米，侧立面高 0.93、宽 1.32 米，枋斗上宽 52、下宽 35×30、高 26 厘米。

兴国寺大殿，其抬梁式殿堂结构、梭形柱、直形柱和前檐柱侧脚的处理方法，以及梁架高跨比（1：3.6）、内柱径长细比（12：1）等特点，均保存了明代的建筑特色。斗拱的布局于明间和次间各施柱间铺坐 2 攒，两梢间各 1 攒。前檐斗拱与前檐柱比为 1：5，斗拱单材 12.5×7.5 厘米，枋斗的用材等亦与宋代《营造法式》制度基本吻合。但是，外檐斗拱殿内面并非用昂来支撑屋面承重，而以华拱逐踩上挑，用花瓣斗拱与椽相连。内檐攀间铺作与后檐斗拱叠成十字木往上跳，其中小斗的形制与明代风格明显地存在差异。如小斗用菱形、拱用花瓣拱交错使用等情况看，则与宋代《营造法式》制度相悖。根据以上特点分析，或为后人多次维修所致，或为地方工匠作法。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进行探讨。

## 二、关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

《广安州新志·寺观志》载：“兴国寺，治南涪水岸上，《寺碑》云，‘创于汉’。《金石记》云‘造于隋，禅院最古，体制宏矩。’唐贞观时，尉迟敬德监修，今题梁尚存。明重修，有郡守许仁、张海、府同知鲁儒、潘亨，学正李定，训导

王钺，御史杨瞻，先后刻诗印江亭东面”<sup>[1]</sup>。这段关于兴国寺建置沿革的记载，涉及到两个问题。即始建年代：以《寺碑》为据，创建时间为汉代；以《金石记》为佐，开创于隋代。志书对两说均未加评说。二是重建时代：以题梁文字为据，重建于唐，且由尉迟敬德监修；明代又重建，亦有题梁和当时的地方慕僚吟诗石刻为证。兴国寺的建造究竟是始于汉代还是隋代？其重建时代又是乎与尉迟敬德相关？值得考证。

（一）兴国寺“创于汉”说，纯系“有佛即寺”之臆说

《广安州新志》引兴国寺《寺碑》所载，寺“创于汉”。《寺碑》刻于何年？因已无物可稽，故无从考析。如按“创于汉”说，也就是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相同。中国的佛寺建筑，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逐步兴建起来的，即应该是先有佛教的进入，才有佛寺的产生。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两说，“一说是最早也不会超过公元前 2 世纪末期，也即是汉武帝通西域以后……另一记载是西汉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 1 年），佛教开始从新疆（古称西域）传到内地，但尚未广泛传播”<sup>[2]</sup>。佛教的广泛传播是“永平求法”之后的事。汉永平年间，明帝夜梦金人，“派蔡愔、秦景等人到天竺（印度）寻求佛法，在半途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邀请他们以白马驮经及佛像来到洛阳。翌年，明帝下令为之建立白马寺，译经传教”<sup>[3]</sup>。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座佛教寺院，即河南白马寺。

异域宗教的传播，必然会受到民族宗教、地理环境、地域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作为西南蛮夷集居栖息之所的渠江流域，本为賁人的活动中心。賁人本以崇尚“白虎图腾”而著称，况且当时的土著賁人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阶段，其原始的生产生活与民族宗教信仰习俗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对于异域宗教的认识理解到接受并非易事。亦如北宋佛教史家赞宁所言：“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三昧不足以化难化之俗也。”如果将兴国寺的创建年代拟为汉说，我们表示质疑。

无独有偶，关于汉置佛寺的方志、碑记并非广安兴国寺《碑记》而独有。近读胡昌健先生

《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文章所列,“成都石犀寺,明天启《成都府志·祠庙》、清嘉庆《四川通志·寺观》皆谓建于汉代。大邑有雾中山寺,即开化寺,明人杨慎撰《开化寺碑》:‘至汉永平十六年始建(寺),住持则摩腾、法兰两尊者。’《四川通志·寺观》:三台‘香林寺……东汉年间建’”<sup>[4]</sup>。此外,胡先生还列举了重庆市域内类式载录数则。对于这些佛寺汉创的记载,迄今为止尚无物以佐其说。特别是诸如明人杨慎所记“住持则摩腾、法兰西尊者”之论,尤为荒唐。摩腾、法兰西明为汉明帝时“永平求法”之后,中国号称佛教第一寺洛阳白马寺之译经传教之僧,竟然附会到四川开化寺之住持,实不可信。但通过上列各志所论不难看出,其造成佛寺“汉创”之说的原因,是“志书将某佛寺的建立附会到早期佛教入蜀的时期了,臆想有佛教就有佛寺”<sup>[5]</sup>。兴国寺《寺碑》所载“创于汉”的记载,均受“永平求法”之影响,即“有佛即寺”之附会臆说。

## (二) 唐建兴国寺非尉迟敬德所监修

按清《广安州新志》所录《金石记》云,兴国寺“造于隋,禅院最古,体制宏钜”,“唐贞观时,尉迟敬德监修”。隋代的广安之域,已经出现了佛寺,如广安冲相寺就是隋开皇八年(588年)创建,其地尚有摩崖石刻题记以证。如果说兴国寺也系隋代所开创,虽然无物以佐,但从当地的佛寺建造史况分析,亦不能轻易排除其建造的可能性。但是,该寺是否为尉迟敬德所监修,值得商榷。

尉迟恭,字敬德,生于隋开皇五年(585年),卒于唐显庆三年(658年)。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州)人。隋末从军于高阳,骁勇善战,以功授朝散大夫。刘武周于马邑(今山西朔州)起兵后,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下,攻陷晋州、浍州(今山西临汾、翼城),击败唐永安王李孝基。唐武德三年(620年),败降归唐,授秦府统军。从秦王李世民击败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徐圆朗等。数次险境中救出李世民。武德九年(626年)参与玄武门之变,射杀李元吉,论功与长孙无忌并为第一。贞观元年(627年)拜右武侯大将军,封为吴国公。居功傲物,与宰相失和,出为襄州都督,封鄂国公。名列凌烟阁功

臣。晚年笃信方术,居家不通宾客,显庆三年(658年)卒,陪葬昭陵。

作为初唐将领的尉迟恭,生平均未到过四川。他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后,历经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等职,但两地均未在南方。到了晚年“笃信方术,杜门不出”,因何又突然到了川东僻县广安督造兴国寺,实不可信也!《广安州新志》云,“唐贞观时,尉迟敬德监修”的依据是“今题梁尚存”。题梁题记今还保存在兴国寺内,文云:“唐朝敬恭卅年农年丙子正月初一日丙申朔月二十日庚申吉旦兴国寺住持修造”。此载是否系尉迟恭监修兴国寺的实物佐证,非也!

(1) 凡唐代之纪年款识,或以大“大唐”记,如广安冲相寺《大唐渠州始安县冲相寺七佛龕铭碑》款:“大唐开元门年□月□日记”;或直接纪年,如《李县令给牛碑》:“开成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记……”<sup>[6]</sup>。

(2) “敬恭”何指无稽。如果说“敬恭”就是尉迟敬德实不可理喻,尉迟恭是其名,敬德是其号,“敬恭”是何指,查无出处。

(3) “卅年农年”又是何指,寻迹于各种有关纪年史料无稽。

此外,“丙子正月初一日”、“丙申朔月二十日”,如果按照隋末唐初的年号查找,“丙子正月”应为隋大业十二年(616年),“丙申”即唐贞观十年(636年),这两年号是乎是题梁所要表达的关于兴国寺建造之始末时间。综题梁的整体行文看,可能还是后世为标榜其修建历史的伪作。

注释:

[1] 《广安州新志·卷三十七·寺观志》。

[2][3] 罗哲文《罗哲文建筑文集》,外文出版社1991年。

[4][5] 胡昌健《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载《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6] 刘敏《广安冲相摩崖造像及石刻调查纪要》,载《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 三普新发现 武胜县三溪渡槽



● 广安兴国寺大殿

